



牢牢抓住跨周期调节历史机遇 推动我国有色金属行业高质量发展

□ 刘祥民

有色金属行业伴随着现代科技进步而发展，是先进装备、尖端科技必不可少的关键材料，是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有色金属行业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果断运用逆周期调节工具确保行业发展始终运行在合理区间，更要主动实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形成系统集成效应。

有色金属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挑战 and 机遇

元素周期表 108 种元素中，64 种为有色金属。我国是最早全部掌握提炼方法的国家之一，具有成功攻克 64 个堡垒的科技攻关记录。航空航天飞行器、武器、高铁等，都离不开有色金属材料；集成电路、半导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手机等，都以有色金属为基材或传导材料。有色金属不仅是我国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基础，也是人民满足美好生活需求的必需品。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发展迅猛，许多大宗有色金属的产量和消费已占据全球的半壁江山，发展成就巨大，但也存在明显短板。一是资源对外依存度高，而且国内企业海外投资未形成高效协作。二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在国家重大项目牵引下，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制造技术已基本实现与国外先进并跑，但是关键基础材料、核心零部件等仍依赖进口，存在被“卡脖子”的风险。三是市场竞争力不强，目前我国有色金属行业 5 万多亿元资产规模，上市部分的市值不足 3 万亿元，市场竞争力和国际话语权不强。

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面对我国有色金属产业大而不强的现状，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面对和审视周期性因素和风险，牢牢抓住跨周期调节机遇，占得先机、赢得主动。

当前，逆全球化潮流助推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叠加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乏力，极大地冲击了全球化大分工背景下的产业链供应链，对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一是产业面临大起大落风险。二是全球技术交流合作受限。三是我国有色金属企业境外获取资源的机会减少、成本提高。

同时，全球正处于新一轮产业变革和技术革命的机遇期，我国政府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目标，作出了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重承诺，将倒逼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强力提升降碳减污能力，推进废弃物资源化产业发展提速。加速研发和应用低碳无废工业技术，在实现有色金属全行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同时，催生一波持续性强的经济增长动能。新业态新产业层出不穷，有助于我国有色金属打造新型产业集群，开发优势产品，做深做强产业链，着力培育“有中做优、无中生有”产业，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实施跨周期调节推进有色金属行业高质量发展

实施跨周期调节推进有色金属行业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规划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出战略部署，为推进有色金属行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国家实施跨周期调节的政策，对于提高我国有色金属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自主可控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实现伟大斗争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服务国家战略增强国际影响力。有色金属大宗资源类商品是产业经济安全的基石。长期以来，我国对大宗商品有着全球最大的需求，但国际资源巨头“囤货居奇”，贸易强国国家“趁火打劫”，导致我国在全球贸易链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随着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决定产品价格的权重逐渐向东方倾斜。近年新探明的铝、铜资源大多处于“一带一路”区域，我国企业在增量开发上具有优势，将有利于构建更为安全的战略资源保障体系。因此，必须着眼国家战略资源保障安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资源战略研究，制定我国战略资源海外合作中长期战略规划。持续加强海外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全球控制能力体系建设，谋划铜、铝等有色金属

属战略资源的全球布局，参与国际市场重大战略资源整合重组，冲破现有全球矿业垄断格局，更专业化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充分发挥我国国内市场的韧性，开放共建国外市场，重构全球贸易机制，加强商业模式创新，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进而战胜西方规制，进一步提升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

坚持科技创新激活发展新动力。构建有色金属行业新发展格局，关键是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才能够促进行业长期稳健发展，最大程度地规避每次周期性风险。我们要着眼建设有色金属行业创新高地，构建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协同推进“点状突破”“链式创新”，加快从产业关联向创新关联升级，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促进人才流动与科研资源共享，破解创新体系“孤岛现象”，解决创新要素“碎片化”问题，培育大中小企业共存的创新生态。必须抢抓全球、全国产业链重构机遇，坚持“前端聚焦、中间协同、终端升级”，瞄准有色金属材料的未来科技，运用“材料基因组”等现代创新方法，为有色金属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激活新变量、增殖新内涵，跨越产业周期的影响。坚持聚焦我国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推进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的技术攻关和成果应用；加强清洁能源消纳能力建设，建立能源企业与有色金属企业协同机制，推动铝企业成为电网稳定的虚拟电厂。充分发挥铝轻量化、可回收、无污染的绿色优势，加快铝的推广应用，积极发展有色金属循环产业，实现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和规模化发展，努力“让有色更绿色，让世界更有色”。

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发展新布局。当前，我国有色金属行业 5 万多亿元资产分布在 8000 多家企业，处于极度分散的状况，行业利润率低于工业平均水平 2 个百分点。“内卷化”的同质竞争，导致行业整体的资产质量、效益效率不高，与国外企业的竞争存在诸多劣势。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次重塑性变革，加快推进有色金属企业专业化整合，改变当前企业分散现状，打破条块分割的“内卷”，提升我国有色金属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更好地应对周期性挑战，有

效防范全球产业链交叉影响所带来的风险。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利用资本市场，培育骨干企业成为具有生态主导力的产业链“链长”，全面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将产业规模优势转化为竞争力优势。要聚焦产业优势领域深耕细作，支持中小企业提升专业化能力，形成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形成梯度优质企业体系。

全面深化改革提升市场竞争力。广大国有企业管理者要清醒地认识到“两个一百年”交汇点的历史方位，围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战略性目标任务，不遗余力地推进创造性、引领性改革。要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相统一，充分发挥党组织在企业改革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正确处理党委（党组）和董事会、经理层等治理主体的关系，坚持权责法定、权责透明、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建立更加成熟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赢得全球产业竞争有利地位的治理效能。紧紧围绕中央赋予国有企业的新使命新任务，围绕效益效率加大 3 项制度改革力度，充分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激活科技、数据等现代竞争要素。稳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实现主责主业更加突出、产业竞争更加有序、资源配置更加优化、产业链供应链更加畅通、科技创新更加有力的改革目标。使有色金属行业坚决扛起“国之重器”使命，成为国家重大战略力量，在应对重大挑战、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中发挥特殊保障作用。

（作者系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



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召开过哪些重要会议？



1935 年 10 月，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情况时说：“每次战斗前，连队的党员都召开会议，选出后备指挥员，大约有四五个人。如果连长在前线受伤或者牺牲了，队伍不会跑散，因为第一后备连长会立即挺身而出；如遇不幸，第二后备连长又会代替他，一个接着一个。”这生动反映了红军在漫漫征途中间以打不散、拖不垮，最根本在于党的坚强领导，“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开会党的重要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党的各级组织集思广益、科学决策、协调关系、宣传动员、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和有效手段。

据统计，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重要会议，留有记录的就有 30 多次，包括中央负责人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等。为了了解和掌握总体情况，这里按照时间顺序，对其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会议作一简单梳理。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等，是争论和调整行军路线的系列会议。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原定计划是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国民党当局察觉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中央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从长征出发时的 8.6 万余人锐减至 3 万余人。湘江战役后，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原定计划。毛泽东审时度势，建议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为了讨论解决行军路线问题，中央接连召开会议。1934 年 12 月 12 日，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毛泽东的建议得到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但博古、李德拒不接受。12 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后，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根据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前进，12 月底到达瓮安县的猴场。12 月 31 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央政治

局在这里召开会议，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会后，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天险。更重要的是，经过这几次会议的一路争论，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

遵义会议是确立党中央正确领导，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重要会议。1935 年 1 月 7 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5 日至 17 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这次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且，遵义会议的重大决策是在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作出的，标志着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不无巧合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28 年以此为界，刚好可以分为两个 14 年，伟大转折的意义更加凸显。

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是贯

彻遵义会议精神的系列会议。1935 年 2 月 5 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小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2 月 9 日，中央负责人会议在扎西老街江西会馆召开，研究下一步进军方向和部队缩编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方针。3 月 10 日至 11 日，中央负责人会议在苟坝召开，毛泽东说服与会者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5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县城附近的铁厂举行扩大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并对林彪等怀疑毛泽东的领导、不同意机动作战的主张进行了批评。这几次会议的召开，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6 月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俄界会议等，是制定和执行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系列会议。懋功会师后，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6 月 26 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会上表示同意，但不久

就借口给养困难，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并提出“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公然向党争权。中共中央坚决拒绝张国焘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8 月 4 日至 6 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讨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团结。8 月 20 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进一步论证了北上方针的正确，强调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红军主力应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8 月 21 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历时数日越过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随左路军行动的张国焘再次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乃至 9 月 9 日电令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与周恩来、张闻天等人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在甘南迭部县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方针是错误的。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实践证明，坚持北上抗日，是红军长征不曾改变的战略目标，也是激励红军走过千难万险的强大动力。正如埃德加·斯诺在《西行

漫记》中所说：“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

哈达铺会议、榜罗镇会议、吴起镇会议等，是确定长征落脚陕北的系列会议。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继续北上，9 月 17 日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根据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的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9 月 20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哈达铺召开，毛泽东强调我们现在的干部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组织部应该调查了解干部，既要了解高级干部，又要了解中下级干部。当天，他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上指出，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9 月 27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榜罗镇召开，正式确定把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会后，红军越过六盘山，于 10 月 19 日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10 月 22 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会议，指出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西北的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并以陕、甘、晋三省为发展的主要区域。这次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全部结束。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中央红军主力在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中，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几个省，粉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重要会议，仿佛一块块路标，前后承接，指示着胜利的方向。这些重要会议，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善于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实际的战略策略，将中国革命事业不断推向前进。